

帶湖與瓢泉

—— 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

程繼紅 著

齊魯書社

帶湖与瓢泉

——辛弃疾在江西的文学活动

曹水林 著

● 文学研究 ●

帶湖与瓢泉

——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

程继红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湖与瓢泉: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程继红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6.12
(小蓬壶丛书)
ISBN 7-5333-1776-9

I.带... II.程... III.辛弃疾(1140~1207)—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3011 号

带湖与瓢泉——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
程继红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招远市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776-9/K·557
定 价 20.00 元

日常生活：作家研究的视界与立场(代序)

20 世纪的哲学与历史学有一个重要转向,便是朝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①文学中对于作家的研究也应由生平事迹延展到日常生活,其中一个基本理念是,我们本来就从生活中吸取自我解释的权利,作家的主体性质必须从生活中得到规定。当我们习惯于对作家做出种种宏大叙事的努力时,请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杜甫过的是李白的的生活,那么他还会是杜甫吗?这就提醒我们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作家的存在之根。

—

现在,我们在作家研究中提倡回归到作家的生活世界,就是要回归到作家们所处的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具体生活情景之中,回到作家的饮食服饰、建筑居住、交通行旅、婚丧嫁娶、社交娱乐、经济往来、卫生保健、身体状况、情感世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过程之中,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考察作家日常生活世界与他

^① 参考衣俊卿《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6年2月14日12版。

所创作的艺术世界之间的深刻关联。

作家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概言之主要体现在:

第一,还原与揭示作家生活原生态。对作家的日常生活研究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之深度层面上寻找和发现其独特性、个别性、主体性,重构作家生存状况的原生态面貌,并由生活而知世、为生活而思想、因生活而审美。

第二,回归与寻找作家研究中已被消解的“人”。以往的作家研究因为习惯于把一个作家置于与社会结构的紧密联系之中,对日常生活进行了过度的消解,出现了只见生平不见生活、只见思想不见“人”的空洞和虚化,这其实是作家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抽象化顽症。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之世,应既包含了那个曾经的时代结构与制度,同时也应涵盖了那个曾经的时代之日常生活。文学的研究应比史学的研究更重视日常生活,因为生活本为文学之源。历史因日常生活而感性并生动,作家则因其日常生活的被研究而复活并亲切。在这个意义上,对作家日常生活研究的回归便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回归。

第三,了解与诠释作家创作之“今典”。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本来就有从作家的日常生活中援引本事展开批评的诗学范例。生活本事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今典。”他说:“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事也。”^①“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藉之出处。”^②陈寅恪还指出,一般而

①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②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言,“古典”并不难理解,因为只要懂得用何典且知出处,便可领会诗人意思。但对于“今典”的诠释则非易事,由于时过境迁,诗人所历当时之具体情境,所经当时之具体人事,已或尘封、或沉淀、或生锈、或残缺破碎不可缝缀、或灰飞烟灭冥渺难求,因此对作家当日之事的研究就成为诠释今典的基本前提。伽达默尔认为,对作品的理解过程始终贯穿着两个彼此关联的原则:其一作品对特定的现时的从属;其二,作品在意义上依赖于观者的参与。^①而前者即是对于今典把握的要求。当然,“特定的现时的从属”不一定就是指向日常生活之维,但日常生活却一定是蕴藏最多“今典”的富矿。从此角度看,对作家日常生活必抱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了解之同情”而加以研究。

第四,修复与重建作家全面史。作家全面史包括作家生平、创作、思想、心灵、情感,以及其与日常生活的有机结合,但以前对作家史的研究过分看重生平、创作和思想,这“老三件”的组合几乎成了作家史写作的范式,而这种缺乏后三者参与的作家史未免有过分扁平化的趋势,尤其是作家日常生活的缺席,必然导致对作家认识的粗浅与弱化。因此,对作家日常生活的关注,可拯作家史由于偷工减料而陷入的尴尬之境。对于修复和重建作家全面史,日常生活研究承担了半壁江山的责任。

由于日常生活本身的属性规定了对作家日常生活研究具有如下明显特质:

1. 对象微观

日常生活是由许多日常琐事构成的细节复合体,是一个在时间之流中由“生”与“活”着渐次完成的画卷,他以琐事的方式

① 参考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而敞开,以超琐事的方式而升腾,以琐事的最终剥落而关闭。琐事不决定日常生活的成败,但却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日常生活形态的丰富与饱满。对日常生活而言琐事是他基本的生命组织。他不拒绝琐事,不因琐事而羞愧,反以琐事为崇拜;他赞美琐事,因琐事而呈现,更以琐事为图腾。基于此一特性,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就必须关注琐事。由于对象的微观化必然要求视界的相应微观化,但须指出,微观不仅是方法与视界,他还是一种理念、一种态度。微观非形而下的“微小”,乃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思维能力对于“小”之意义的开掘。在日常生活之域,任何形式的“小叩”,都潜伏着惊醒“大鸣”的无限可能。

2. 视点下移

以往对作家的研究主要在超拔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层面进行,注意力集中在非日常生活中作家与时代与民族与家国之情感关联。即使以作家个人而论,亦只重其生平或人生过程中具有拐点意义的一二大事。当然,这种向上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但对于作家的全面史而言,这只是系统工程中的主体工程,是关于作家史的“内容摘要”和“关键词”。何况因为主体工程具有形象工程的性质,往往因仰视而拔高研究对象或因拔高而有意造成仰视,故这种“宏大叙事”理念支持下的思想开发工程未免易于造成结论的虚高。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作家研究或作家的日常生活研究要求把作家看成一个生活中人、性情中人,甚至是一个还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总之是一个真实的人。目光由非日常下移到日常,由崇高下移到非崇高,由向上的研究转而而为向下的研究,从水面潜入池底,由莲荷探及淤泥。这意味着它并不必回避世俗甚至庸俗,不必拒绝瘢痕甚至肿瘤,因为这对探明历史的事实仍是有意义的。

日常生活史学本来就建立在一切琐事皆有意义的认识论基础之上，而研究之目的就是要说明其意义。以鲁迅为例，他的日记，多数内容记录琐碎的稿费收支情况，是经济往来的流水账目。有时看他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俨然变成一个锱铢必较、精于计算的鲁迅，但我们却能够通过他的经济生活，观察到他是如何独立完成由一个“作家鲁迅”朝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鲁迅”转向的全过程。这在今天于我们仍然有着无限的启示，他也因此在另一层面赢得我们格外的尊敬。因此，通过视点下移，在日常生活之域亦将不断丰富与开拓鲁迅研究的意义之域。这对于其他作家的研究同样如此。

3. “他者”立场

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具有不同面目，因此也决定了我们对待两种生活的不同面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与制度对人的种种规定之外，日常生活就仿佛是感性的芳草地。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他者”的立场一同去感受并享受。那么，“他者”是谁？“他者”之他，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站在“他者”所处位置，与“他者”一样对日常生活持相同的面向。我们不仅要了解“他者”之观，观“他者”之观，更要以“他者”之观为观，理解“他者”的深度便是探测日常生活深度的标尺，而你是否理解自己也以是否理解“他者”为前提。日常生活赋予我们以“他者”立场的权利，但在非日常世界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他者”的邀请，因为这个“他者”其实是结构与制度，如果有邀请，那一定是我们必须被规定着。为感谢日常生活，所以一旦确立“他者”立场，无论要走多远，我们都必须到达生活现场与“他者”会合。

二

中国古代对文人生活中趣闻轶事有搜集、保存与传播的爱好,像各种野史、笔记、小说等都为我们研究作家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方便。即便如正史的写作,也都不仅限于政治、军事、制度等方面的素材取舍,更有从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取材,这一方面固然增加了历史的可感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对历史的日常生活可作一定程度的管窥。中国的哲学亦强调日常生活的触发,儒家哲学自不待言,即使如以玄思妙想著称的老庄哲学,亦不拒绝“道在狗矢”的日常生活以及用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凡在中国文化中,一切高深与艰涩似都能够与日常生活产生沟通,然后从塔尖迈步下来,回到日常受用之中。禅的哲学便是最日常生活的哲学,或者说对日常生活的顿悟本来就是获得禅的取道。因此,各种思想、智慧都视日常生活为乐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它从来不对日常生活作出拒绝,相反却对之表示皈依。

由是,中国诗学也十分重视诗人日常生活事迹的考证,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诗学中的援引本事以说诗的传统,我们将其称之为“本事派”或“生活派”诗学。事实上以日常生活为途径而切入的研究,在20世纪有两位人物值得一提,这便是鲁迅和陈寅恪。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便是从魏晋日常生活的主要事象入手,而探及那个时期总的人生与审美价值趋向,这已成为对日常生活素材成功处理与运用的学术范例。王瑶后来的《中古文学史论集》就是沿着这一学术理路对古文人生活与创作做了进一步研究。陈寅恪先生一生兼治文史之

学，其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之卓越。而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先生尤注意历史人物及其与生活环境之关系。如他针对全祖望批评柳如是饮酒一事而指出：“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全祖望）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全祖望援引闺门礼法，而陈寅恪则服膺于生活事实。他从生活立场再一次表现了对历史人物所抱的“了解之同情”。至如陈寅恪先生以生活视角去解诗，则更使人多有重回现场之感。他说钱谦益写柳如是“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诗云：

“全身耐晓寒”，必非泛语，第叁章论卧子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句，已略及河东君个人耐寒之特性。顾苓《河东君传》云：“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题此传云：“冬月御单衿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皆与耐寒之特性有关。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著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著单薄，则体热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见石头记第柒及第捌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

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案，此句用后汉书列传肆肆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卧子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销魂矣。^①

姚斯把文学解释学活动设计为文本的三级阅读：初级阅读，即审美感觉阅读的视野；二级阅读，即反思性解释阅读的视野；三级阅读，即历史的阅读视野。假如我们对钱谦益与陈子龙二人诗词仅作称誉柳如是遭遇困难坚忍不挠这一层面的理解，那还只属于姚斯所谓的一、二级阅读，则此对柳如是的描写亦不超出通常人的审美与反思范围，但若以历史的视野，让我们重返历史的现场，再回柳如是的生活当中，则陈寅恪先生那一大段文字，就是对生活“今典”的适度诠释，并从生活场域拓展了这首诗的意义空间。

以上所举，是鲁迅和陈寅恪两位先生从生活视角和立场对他们面临的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范例，而涉及对作家具体生活进行研究的论著，最近十几年主要有黄正建《韩愈的日常生活研究》、钟来因《杜甫的病、药及诗风》、谢思炜《白居易的家世和早年生活》等，亦足资参考。此外，制度本是国家行为，但如果制度对于生活有所规定，并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时候的制度研究，就必须和生活研究对接。若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都含有这方面的努力，也可认为是对唐代文人生活的间接研究。因为唐代的科举制度无论你是否接受，都已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生活

^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62页。

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于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实质就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对唐宋词的发达作出的生活的解释。试想，当活跃的歌妓制度没有成为唐宋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时，唐宋词还会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面目吗？唐宋歌妓制度，事实就是一种作为生活的制度，作为这种制度的现场直播，词也几乎成为这种制度所规定的生活的一个有机体。

三

在词学界，辛弃疾研究一直是20世纪最热门的研究，同时也是重复最多的研究。而人们对于辛弃疾的认识大都把他视为一个悲剧人物，其悲剧一生几乎成为对他的最高抽象，但对辛弃疾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全面甚至是毫无依据的。首先，目前对他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论述是不充分的。我们在面对自己景仰的历史人物时都容易犯一种溺爱症，即不顾历史事实夸大历史人物所受的委屈。比如，辛弃疾南渡之初，我们就先验地也是天真地设想朝廷应该给予他一个较高的官职，以这样的心理预期，结果发现朝廷不过授他一个建康通判，于是便固执地认为他是不被重用，是朝廷对他的不公，是他一生悲剧的起点。其实我们只要对南宋的用人制度以及看待归正人的一贯态度，就会发现朝廷对他的任职应该说是较为合理的。这个职务就辛弃疾本人而言，似乎在他的词里并没有表示过不满，倒是我们这些热爱他的后人一直为他抱屈，纷纷表示不平：仿佛以辛弃疾的才能，开始就是给他一个巡抚也不过分，通判未免是太屈才了。在辛弃疾的从政生涯中，他曾三次遭弹劾，三仕三已，仕途多舛。这在

古代本也是一般官吏常要遭遇之事，想想我们所熟悉的文人，哪位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为何轮到辛弃疾就成了悲剧？这样的遭遇自然不幸，但还没有到要用悲剧来形容的地步。这都可看做是由于对历史人物的溺爱才有的夸大之辞，原本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其次，把辛弃疾的一生定位为悲剧的一生，还有一个他的抗战事业中辍以至于毁弃的理由。这本来是一个最佳的理由，但在南宋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个理由对于个人的意义事实上已被消解了，除非他像岳飞那样，遭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才可另当别论。如果把整个南宋的历史都看做是一幕大的历史悲剧，则似乎生活在南宋的所有历史人物都应是这个时代悲剧的殉葬者，因此，他们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不能具体到某一个人。即以辛弃疾而论，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身上确实比一般人要多一些那个时代悲剧的折射，但就他的整个遭遇而言，其不幸的广度与深度使他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基本条件。我们这样说，并非有意贬低他，而只是道出一个事实，即他的一生还够不上“悲剧”这两个字所蕴涵的特质。但没有悲剧身份的辛弃疾仍以他独特的方式成为让我们永远尊敬的作家之一，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怀疑的。

长期以来，在受文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要恢复对一个作家的平视型研究，必然会有许多心理或观念上的障碍。以往对辛弃疾的研究都抱一种仰视心态，其主战思想、悲壮情感、英雄行为成了研究的重点并不断被重复。本书则以平视的角度，对长期被忽略的辛弃疾作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丰富性、复杂性和多面性进行揭示与论述。所以选择他从淳熙到嘉泰寓居信州近二十年作为研究的时段，乃因为这个时段的生活最具日常性特征。我们若对一个作家真正抱以了解之同情，那你就

会经常性地想到一个问题：在辛弃疾罢职赋闲的近二十年中，这七千多个日夜他是如何度过的呢？我们若想回到历史的现场中去看看，而这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处，是他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致使以诗证史得以成为可能。所幸，辛弃疾留下了六百二十九首词。一般而言，词作为作家日常生活的记录，比起诗来具有更强的资料意义，这主要体现在词比诗更适合记录与保存作家的私生活。一个作家在诗中表现的多是台前形象，而词可能就是幕后的本色，这往往为我们的研究带来许多意外的惊喜。当我们从日常生活角度去研读辛词时，发现其中有许多我们以前未曾注意的日常生活素材，这足够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与辛弃疾一道缓慢地回忆、咀嚼与品味。所以，我们的研究基础主要建立在文本细读之上，尽可能由辛弃疾本人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日常生活现场，为我们充当导游并解说。当然，辛弃疾同时代与他有所交往者，也为他的解说提供了不少的补充。

通过对辛弃疾日常生活的考察，让我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辛弃疾印象并非目的，这不过是我们把辛弃疾还原到一个人、一个生活中人、一个性情中人的第一步工作。对辛弃疾日常生活进行研究，必然涉及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这种微观的研究，将为逐步建立辛弃疾的生活档案提供依据，并引发人们从生活角度去考量他的思想、情感和创作之所以形成如此面貌的原因，这才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总之，我们的每一天都生活在日常之中，但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又不屑于日常；日常其实离我们最近，但在我们的观念之域又

常将之放逐到最远；我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其实最热，但我们对待日常的态度又往往降到最冷。这就是我们对待日常生活的矛盾心理，也是日常生活本身与生俱来的悖论。日常生活以往的作家研究中常被边缘化甚至根本就不被纳入视野，因为它常被视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客观存在的结构与制度之外琐屑的世界，但恰恰就是这个琐屑的世界才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最真实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能从结构与制度中得到解脱，那么也至少应把日常生活视为一方滋养地，而它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作家研究而言，日常生活就不仅是视界，更是立场。

目 录

日常生活:作家研究的视界与立场(代序)	1
第一章 南宋信州社会状况	1
一、信州的地理	1
二、信州的经济	2
三、信州的文化	3
第二章 带湖考	6
一、带湖的概念	7
二、带湖的位置	8
三、占地与规划	12
四、带湖的建筑	14
五、带湖的风景	17
第三章 瓢泉考	20
一、瓢泉的位置	20
二、瓢泉的风景	22
三、瓢泉的建筑	27
四、辛弃疾入住瓢泉时间考	34